

## 中外关系

# 中美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 ——基于双方官方发言的解读\*

顾国平 董继荣

[摘要] 本文基于 2004 年 7 月到 2008 年 7 月四年间中美官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主要发言和声明,从批判话语分析(CDA)的视角对双方话语所体现的各自的立场和政策及其背后的原因进行解读和分析。研究发现美方单方面认定达尔富尔地区发生了“种族灭绝”,并对苏丹政府实施制裁,借此缓解国内政治压力,转移国际舆论的视线,并阻止别国利用苏丹的石油资源。与之相对,中方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当地的贫困和欠发达,主张各方通过对话和平等协商,消弭分歧,解决危机。与此相一致的是中方为危机的和平解决付出了巨大的外交努力,展示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关键词] 美国;中国;达尔富尔;官方发言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1755(2010) 01- 0027- 34

达尔富尔位于苏丹西部,面积 50 多万平方公里,人口 600 多万,人口构成主要包括居住在北部以游牧为主的阿拉伯人和生活在南部从事农业的黑人。2003 年 2 月,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黑人居民相继组成“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达尔富尔危机爆发。危机的发生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包含了经济落后、人口膨胀、环境恶化以及民族矛盾和分离势力等诸多因素,<sup>[1]</sup>但从根本上说——借用苏丹驻华大使萨利赫的话——“问题出在发展不足”。<sup>[2]</sup>

在达尔富尔危机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社会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直到 2004 年上半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媒体才开始大量报道和渲染该问题。由于中国同苏丹政府在经济上有广泛的合作和联系,再加上苏丹政府起先顶住西方的压力拒不让步,中国也被推上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国政府在处理达尔富尔危机中的角色备受各方关注。

本文以 2004 年 7 月到 2008 年 7 月四年间中美官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主要发言和声明为基本材料,<sup>[3]</sup>从批判话语分析(CDA)的视角对双方话语所体

现的立场和政策进行解读。官方发言和声明属于政治语言的范畴,而语言和权力的关系向来是批判话语分析的重要话题。福柯曾说:“语言和话语本身亦即权力”。<sup>[4]</sup>批判话语分析尤其关注的是语言的使用者,特别是当权者,如何使用语言来实现特定的目的。<sup>[5]</sup>透过批判话语分析的视角,语言——包括政治语言——不仅仅是一套由独立的文字符号构成的抽象体系;更重要的是,语言所传达的意义依附于其发生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环境,承载着言说者的目的。照此逻辑,政治语言就是政治活动的参与者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采用的一定形式的语言,不仅“是传播符号的工具,又是政治的武器”。<sup>[6]</sup>因此,使用批判话语分析的视角解读中美官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主要发言和声明,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双方语言背后的目的和原因。

### 一 中美双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

这一部分主要是对中美双方在 2004 年 7 月至 2008 年 7 月间就达尔富尔危机发表的官方言论和声明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旨在揭示双方在危机的性质认定和解决途径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和共识。<sup>[7]</sup>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美官方语言的文化差异及其语言策略研究”成果之一,批准号:06BYY015。

表一 中美关于达尔富尔危机性质的关键词词频

关键词	词 频	
	美 方	中 方
Genocide/ 种族灭绝	40(25) <sup>1</sup>	1( 0)
Disaster, catastrophe, calamity/ 灾难	7 ( 6 ) , 4 ( 4 ) , 1( 1)	5( 3)
Crime* ④/ 罪行, 犯罪	13(12)	0, 2( 1)
Violence/ 暴力	47(44)	1( 1)
Atrocit* / 暴行	18(18)	0
Tragedy/ 悲剧	4(4)	0
* develop* / 发展	7(3)	83(74)
Poverty, poor, backward* / 贫 困, 贫穷, 落后, 欠发达	1(0), 2( 0) , 0	10 ( 5 ) , 5 (4), 5(4), 4 (4)
Conflict/ 冲突, 战乱	35	31, 10
Crisis/ 危机	24	18
Humanitarian/ 人道	69	45

注: <sup>1</sup> 第一个数字表示该词在语料中总共出现的次数, 括号中的数字则是美方或中方基本认同用该词来描述达尔富尔危机性质的次数。

④\* 为搜索工具, 包括以该词根为基础的所有前后缀词形变化。以\* develop\* 为例, 以下这些词都会显示在搜索结果中: underdevelop, overdevelop, developed, developing, development, developments, developmental, underdeveloped, overdeveloped, undeveloped, underdevelopment, overdevelopment 等。

从表一可以清晰地看出, 美国和中国在如何为达尔富尔危机定性的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分歧, 其焦点在于达尔富尔危机的本质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

美方认为达尔富尔危机是政治性的危机, 是苏丹政府施行暴政的结果。以“种族灭绝”为例, 该词在美方材料中总共出现了 40 次, 其频率达到了平均每篇 2.0 次。而且, 在这 40 次中有 25 次美方都直接认定达尔富尔问题的性质就是苏丹政府纵容和协助阿拉伯民兵对黑人施行种族灭绝政策。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方材料中该词总共只出现了 1 次, 而且追溯该词的上下文后可知, 该词并非出自中方官员之口, 而是出现在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时的一位外籍记者的提问中。<sup>[8]</sup> 由此, 可以看出中方不仅不认为达尔富尔问题构成种族灭绝, 而且在涉及达尔富尔的官方发言中避免使用该词。在“灾

难”、“罪行”、“暴行”、“暴力”和“悲剧”等关键词上, 也出现了美方频繁使用而中方尽量不用或避免使用的现象。特别是“暴行”和“暴力”两个词, 美方材料中总共在 62 处场合使用这两个词来形容达尔富尔危机, 频率达到每篇 3.1 次, 而中方材料中仅有 1 次使用了相对程度较轻的“暴力”一词。

与上面中方尽量避免使用否定性的和政治性的关键词正好相反, 中方材料总共有 91 次从“发展”、“贫困”、“落后”等经济角度看待达尔富尔问题, 频率高达每篇 4.55 次。其中有 12 次中方明确地认定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 认为只有解决了当地的发展或贫困问题,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同中方相反, 美方材料中只有 3 处从发展的角度看待达尔富尔问题, 认为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也包含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 并且美方材料中没有一处认为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问题。

当然, 表一也显示中美双方在达尔富尔危机性质的问题上也存在一些共同点。由于达尔富尔地区反政府武装同政府军的冲突, 双方大量使用武力, 致使当地人民流离失所, 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很多人成为难民。因此, 虽然中美强调危机的不同根源和本质, 但是双方一致认为达尔富尔地区发生了动乱, 构成了人道危机。“人道”一词在美方和中方材料中各出现了 69 次和 45 次, 达到了平均每篇 3.45 次和 2.25 次。

表二 中美关于达尔富尔危机解决途径的关键词词频

关键词	词 频	
	美 方	中 方
Sanction* / 制裁	74 (61)	49( - 22)
Sovereignty/ 主权	4( 2)	17( 16)
主权和领土完整	0	14
Equal* / 平等	4( 0)	23( 21)
平等协商, 平等对话	0	8, 6
发展援助	0	12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id/ 人 道援助、救援、救助	14, 6	8, 4, 1

同前一问题相似, 中美双方在达尔富尔危机的解决方式上也存在巨大分歧。在美方的材料中, “制裁”一词出现了 74 次, 除了一部分使用在不相关的场合 (如制裁委员会、制裁决议等专有名词) 外, 其中有 61 次不是直接赞成制裁, 就是将制裁当作美国政府对苏丹的既定政策来使用, 频率高达每篇 3.05 次。很明显, 美方主张对苏丹政府实施制裁, 逼迫苏丹接受其条

件。“制裁”一词虽然在中方材料中也出现了49次,但是中方没有一次是以肯定的态度使用该词的,倒是有22次场合明确表明了反对对苏丹政府施加制裁措施。

中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表现在“主权”和“平等”等词的使用上。中方材料中“主权”一词总共出现了17次,其中16次用在了同苏丹相关的场合。而且这16次相关场合中,有14次使用在了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上下文语境中。而美方材料中“主权”一词虽然也有2次用在了同苏丹相关的场合,但这两次都没有出现尊重苏丹主权这样的语境。与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逻辑相一致,中方还在21处场合主张达尔富尔危机的解决要通过“平等”的方式。而美方材料中出现的4个“平等”则没有一次使用在同处理和解决危机相关的场合。更具体来说,中方材料中的“平等”有8次和“协商”、6次和“对话”搭配。

当然,中美双方并非没有共同点。以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何种援助的问题为例,“人道援助”和“人道救援”等词都多次出现在双方的发言和声明中,其中美方20次,中方13次,这是由于——如上文所述——双方都认为达尔富尔危机是人道主义危机。当然,在援助问题上,双方也表现出了不同:除了“人道援助”,中方材料还有12次提到了“发展援助”,而美方却没有一次使用“发展援助”。这既缘于双方对危机性质的不同认知,同时也表明中方注重标本兼治,既要通过人道援助缓解当前的危机,还要通过提供发展援助、促进当地经济建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纵观中美双方在达尔富尔危机的性质认定和解决途径两个问题上的立场,美方从政治角度出发,认定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政府针对其黑人公民的“种族灭绝”政策,认为苏丹政府要为达尔富尔危机负首要责任。与这一认识相对应的是,美国主张制裁,要求苏丹政府让步,接受反政府武装的条件,构成了对苏丹内政的干涉。而且由于苏丹政府不屈服于压力,美国便在实际政策中实施了制裁。

美国官方和民间从一开始就认定达尔富尔发生的是“种族灭绝”。200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认定达尔富尔冲突为“种族灭绝”,<sup>[9]</sup>要求政府采取行动。2004年9月9日,当时的国务卿鲍威尔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也宣布达尔富尔发生了“种族灭绝”。<sup>[10]</sup>在此前后,除了一些激进的人权组织之外,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达尔富尔问题上都没有使用“种族灭绝”一词。2005年1月31日,联合国的一个调查团经过调查发布了一份有关达尔富尔危机的报告,否认

苏丹政府在达尔富尔地区实施了“种族灭绝”。<sup>[11]</sup>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仍然一意孤行,坚持认为达尔富尔地区发生了“种族灭绝”,并对苏丹实施制裁,背后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首先,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政府做出这一认定主要是选举年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为的是安抚国内压力和选民情绪,而不是要动用美国的全部政治资本和影响力去阻止暴行的发生。事实上,布什政府在认定‘种族灭绝’的道路上采取的很多行动都是刻意为之,目的是既要在国内产生最大的政治影响,又要在国外动用最少的资源。”<sup>[12]</sup>其次,美方希望通过达尔富尔问题转移视线,疏解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国际舆论压力和道德压力。到2004年,美国当初发动伊拉克战争使用的借口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而美军在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丑闻的曝光使世界惊愕。此时,全世界在“9·11”恐怖袭击后给予美国的同情开始变为一片声讨和挞伐,美国从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道德形象急速滑坡。这时的美国急需有新的国际事件来转移国际舆论的视线,而达尔富尔问题正是一个可以塑造成焦点的事件。当美国官方做出“种族灭绝”的认定后,美国的媒体立即将报道的焦点从伊拉克部分地切换到达尔富尔,不仅希望凭借美国媒体强大的影响力转移国际舆论的注意力,还试图在一个新的问题上树立美国道德领袖的地位。再次,苏丹的石油也是影响美国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自巴希尔总统1989年创建政权以来,苏丹同美国的关系一直紧张,虽然“9·11”后由于苏丹同美国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两国关系一度缓和,但由于苏丹国内局势一直不稳定,美国无法控制苏丹的石油资源。其实,美国觊觎苏丹的石油资源由来已久,美国的副国务卿曾在同苏丹官员谈判制裁问题的过程中,从口袋里拿出两张美国石油公司老板的名片,说他们希望在苏丹开采石油。<sup>[13]</sup>达尔富尔危机为美国提供了借口,可以借此向苏丹政府施压,阻止其在别国的帮助下开发利用石油资源。美方设定的“种族灭绝”的话语体系衍生出一个逻辑,即,苏丹政府实施的是暴政,向一个施行暴政的政府购买石油或协助其开发石油资源就等于为其施暴提供资金支持,因而有了助纣为虐的性质。这样,美方制造出的“种族灭绝”的概念就等于给投资于苏丹石油行业的国家戴上了道德枷锁。

与美方相反,中方认为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地的贫困和落后,只有发展当地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一认识不仅同前述苏丹驻华大使的话语中传达的苏丹官方立场一致,而且也同联合国秘

书长潘基文的看法基本一致。潘基文认为达尔富尔冲突缘于气候变化造成的食物和水资源缺乏等生态危机,要真正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必须实现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sup>[14]</sup>对于危机的处理,中方主张不能动辄施压,挥舞制裁的大棒,因为制裁体现的更多是强权政治,不仅效果不理想,而且会使问题复杂化。中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一方面主张要在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消弭分歧,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另一方面,当西方国家对苏丹停止援助甚至实施经济制裁时,中国却努力向苏丹提供发展援助,包括在达尔富尔地区修建供水系统以缓解该地区的资源紧缺状况,致力于通过帮助当地加速发展来消除冲突的根源。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用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的话说——“深深扎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和悠久的历史中”,<sup>[15]</sup>反映了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此外,由于中国同苏丹以及其他非洲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都有遭受过西方殖民统治的经历,所以中国能准确地把握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对制裁政策所体现的强权政治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难怪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泽纳维在会见刘贵今时说,“中国说出了非洲想说的话”。<sup>[16]</sup>

中美双方在达尔富尔危机上的这些分歧必然导致龃龉,阻碍双方在该问题上协调步调。而且由于中国是苏丹石油行业的最大外国投资者,美方阻止别国利用苏丹石油资源的心态使其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尤为激烈。其实,中国对苏丹石油资源的协助开发已使苏丹的石油行业在近几年得到了蓬勃发展,带动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政府收入,增强了其建设经济的实力。但美方对此置之不理,不断向中方施加压力,要求向它的立场和政策靠拢。2007年6月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422号有关达尔富尔问题的涉华决议案,不仅明确要求中国政府“公开承认并谴责发生在达尔富尔的暴行”,“立即停止同苏丹政府的经济合作和在苏投资”,而且还说“奥运精神同任何直接或间接支持种族灭绝的行为不相容”,<sup>[17]</sup>暗指中国支持了苏丹政府对黑人的种族灭绝政策。除了美国国会,以女演员米娅·法罗为代表的一些民间力量也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并将达尔富尔问题同2008年北京奥运会挂钩,声称北京奥运会是“种族灭绝奥运”。<sup>[18]</sup>美国国会和民间代表对中国的上述指责,都意在将中国描绘成为一个助纣为虐的不负责任的国家,同时把美国打扮成为一个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国家,其目的都是借此抬升美国自己的道德地位,

同时给中国利用苏丹的石油资源制造障碍。因此,中美双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分歧不仅影响到了双方在该问题上协同合作,而且还成为了美方指责中方、美化自己的一个主要借口。

二 中美双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实际政策

美方的实际政策

如上所述,美国政府认为达尔富尔危机构成了“种族灭绝”。但是,美国政府在做出这一认定之后,并未完全按照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及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的要求采取严厉措施。当国务卿鲍威尔于2004年9月9日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第一次代表白宫正式宣布达尔富尔发生了“种族灭绝”后,他说:“做出这样的判断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采取任何新的行动”。<sup>[19]</sup>事后,美国除了呼吁联合国对达尔富尔危机开展一次全面的调查外,确实没有在其已经对苏丹实施制裁的基础之上采取任何新的措施去制止其所谓的“种族灭绝”。考虑到上文提到的原因,美方的这种虎头蛇尾的反应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美方认定达尔富尔发生“种族灭绝”的初衷并非是对达尔富尔问题的真正关心,而是出于转移视线、抢占道德高地的需要。再加上美方当时深陷伊拉克战争,没有能力开辟新的战场。因此,美方从一开始就既无心也无力去制止“种族灭绝”。

做出“种族灭绝”这一认定后,美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政策体现出两个特点。一方面,美方坚持己方认定的“种族灭绝”这一立场,并采取与之相应的诸如制裁和禁运等政策。直至2007年9月25日布什总统还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发言中大谈特谈达尔富尔地区的“种族灭绝”问题,<sup>[20]</sup>继续抬高美国的道德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无心也无力单独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危机,而且美方启动的一些外交斡旋也由于其认定“种族灭绝”的立场而无法取得真正的效果,因此美国开始利用其他国家对苏丹的影响力。而中国由于同苏丹政府的良好关系,成为了美国争取的主要目标。

如上所述,美国国会和民间代表在不少场合就达尔富尔问题或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进行施压和指责,但是分析美方材料中出现的“中国”字样后,发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见表三)。

表三 美方对中方角色的立场

立场	肯定/鼓励	中立	否定/指责	合计
次数	9	8	0	17

注:此处数据基于对“Chin\*”关键词(包括China, China’s和Chr

ness) 的词频统计。该词在美方材料中共出现 28 次,除去出自记者之口和与达尔富尔问题不相关的场合,有 17 次涉及美方官员对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角色的看法和评价。

从表三可以看出,在总共 17 次相关的场合中,美方官员有 9 次肯定了中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政策或对中方进行了鼓励,没有一次否定中国的政策。举例来说,美方对中方政策的肯定性评价包括“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在促成亚的斯亚贝巴协议(Addis compromise)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sup>[21]</sup>和“中方一开始就为 UNAMID(达尔富尔联合国混合行动组织)派出了工程兵,我们对此表示欣赏”等。<sup>[22]</sup>更值得一提的是以下两处评价:“我们将俄罗斯和中国的弃权视为是对实施制裁的默许”<sup>[23]</sup>和“如果我们回顾去年(2006 年)8 月份安理会通过有关达尔富尔的决议,中国让决议获得了通过。”<sup>[24]</sup>这两处评价所指的分别是 2006 年 4 月 25 日和 2006 年 8 月 31 日中国在安理会涉及达尔富尔问题的 1672 号决议和 1706 号决议上投了弃权票的情况。有意思的是,美方非但没有指责中国不投赞成票,反而两次都对中方的不同立场进行了正面的解读,甚至有些一厢情愿地认为中方弃权而没有否决决议是对美方政策的“默许”。这显然说明美方为了确保中方以后在类似的决议上不投否决票并引导和促使中方更加支持美方的立场,而在努力搁置和回避同中方的分歧,而且是以一种略显牵强的方式进行回避。对照前面美国国会和部分民间人士的刺耳的声音,美国行政部门的发言和声明对中国采取了鼓励和引导的策略。可以说,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前者对中国唱白脸,后者唱红脸。这一不同策略的组合,既借损毁和贬低中国的形象增加了美国的道德得分,给中国利用苏丹的石油资源制造了障碍,同时又充分利用了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影响力以及同苏丹政府的良好关系,引导中方按其设定的议题和节奏处理达尔富尔问题。

#### 中方的实际政策

首先,从中方对联合国安理会的一系列达尔富尔问题决议的投票情况看,中方既坚持了一贯的立场,同时也体现了避免与大国直接对抗的外交灵活性。从 2004 年 7 月到 2008 年 7 月,联合国安理会总共通过了 24 项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决议,<sup>[25]</sup>中国在这其中的 6 项决议上投了弃权票(见表四)。

表四 中国投弃权票的安理会决议

决议号	投票日期	主 题
1556	2004/07/30	支持在苏丹部署国际监督人员,并对苏丹进行武器禁运

决议号	投票日期	主 题
1564	2004/09/18	扩大部署在达尔富尔的国际监督员队伍的规模,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对该地人权受侵犯的情况进行调查
1591	2005/03/29	成立一个安理会委员会监督有关达尔富尔决议措施的实施情况
1593	2005/03/31	将达尔富尔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ICC)
1672	2006/04/25	关于 1591 号决议第三段涉及苏丹个人的决议措施的实施情况
1706	2006/08/31	扩大联合国在苏丹的行动规模,支持实施《达尔富尔和平决议》

信息来源:安理会决议投票记录查询网页:<http://unbisnet.un.org:8080/ipac20/ipac.jsp?profile=voting&menu=search&submenu=power#focus>.

这些中国投了弃权票的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都是美国和西方的立场,都利用达尔富尔地区发生的人道危机对苏丹政府施压,在未经苏丹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要求或派驻国际监督人员,或调查人权状况,或实施武器禁运,甚至还要将达尔富尔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sup>[26]</sup>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要求都构成了对一国主权和内部事务的侵犯,它们所包含的施压、禁运和制裁的内容同中方提倡的以平等、合作的方式处理问题的立场不符。鉴于这种根本性的分歧,中方完全可以否决这些决议。而我们看到的是中方对这全部 6 项决议都选择了弃权票,避免同决议的提案国发生正面的冲突。这种选择固然是多数国家在遇到类似情况时通常采取的做法,但是它更多的是表明中国既坚持原则但又不囿于原则的灵活性,为国际社会继续共同推进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留下了合作的空间。

中方不仅在安理会避免与西方扩大分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在实际的外交行动中也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和建设性。尤其是在 2006 年底实施“安南方案”<sup>[27]</sup>第二阶段时,苏丹政府担心国家主权和安全会因联合国部队的部署而受到威胁,因此拒绝批准实施第二阶段方案。达尔富尔危机又陷入僵局。对此,中国在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应对措施,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sup>[28]</sup>2007 年 5 月,中国政府任命了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在此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刘大使两次出访非洲,积极斡旋,同包括苏丹、非盟、阿盟和西方各国等在内的各方协调立场,努力推进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进程。同时,中美双方在双边对话中也加强了交流。2007 年 6 月 20 日和 21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与美国副国务卿内格罗

蓬特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就包括达尔富尔在内的诸多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表示要“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继续丰富两国关系的全球意义和战略内涵,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sup>[29]</sup>

除此之外,中方在尊重苏丹主权和反对制裁的基础上,越来越清晰地向苏丹表明己方立场,希望苏丹政府接受联合国部队。其实,中国驻联合国大使王光亚早在2006年9月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就曾说:“我们已经向他们(苏丹)表明由联合国(代替非盟)接手维和工作是个很好的主意,但是是否接受得由他们自己决定。”<sup>[30]</sup>到了2007年初,中方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明立场,同时希望苏丹政府能在联合国驻军方面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中方材料中的“灵活”一词颇能说明问题(见表五)。首先,在“灵活”一词总共出现的17次中,有9次出现在了中方“希望苏丹政府在安南方案上进一步显示灵活”的上下文语境中。在这些场合中,中方清晰表明了自己赞成安南方案、支持向达尔富尔派驻联合国部队的立场,明确地向苏丹政府传递了一种期待,同时还晓之以理,向对方说明如果达尔富尔问题久拖不决,不仅给西方留下继续指责和制裁的口实,而且更不利于本国人民的生活安定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其次,从“灵活”一词在中方材料中最早出现的时间来看,中方是在2007年4月——也就是危机各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开始要求苏丹方面更加灵活。这说明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在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参与国际社会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努力。

表五 中方材料中的“灵活”一词

总次数	出现在“希望苏丹政府在安南方案上进一步显示灵活”的上下文中的次数	最早出现时间和发言场合
17	9	2007年4月17日,“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就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

三 结语

中美双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所展示的是:美方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出发,一意孤行地认定该问题构成了“种族灭绝”,并据此对苏丹政府进行施压和制裁。一方面,美方举起道德大旗,对苏丹政府以

及支持苏丹的国家横加指责,试图转移在伊拉克问题上自己所遭受的国际压力;另一方面,在新的国际问题的焦点制造出来之后,美方又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影响力,促使问题朝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与之相对,中方从问题的实际出发,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当地的贫困和欠发达,只有通过帮助当地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中方反对制裁,反对他国利用达尔富尔问题干涉苏丹的内政,坚持在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让相关各方通过平等协商寻求解决的途径。特别是从2007年达尔富尔危机陷入僵局开始,中方明显在达尔富尔问题上投入了更多的外交努力,积极在各方之间搭桥牵线,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中方的外交努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促进了达尔富尔局势的缓和。这不仅使中方自身在苏丹的经济利益得到了更好的保障,而且中国政府积极劝和促谈的表现也维护了自己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对苏丹政府来说,中方的政策不仅使其免于孤立,还维护了其主权和尊严,保证了它在达尔富尔和平进程中的核心地位。中国的表现还使包括美国在内的那些曾一度主张进行军事干预的国家受益,因为要是在没有苏丹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向一个动荡不安的地区贸然出兵,很可能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不仅无助危机的解决,反而会使问题扩大化、复杂化。<sup>[31]</sup>因此,中国政府赢得了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各方的赞誉。<sup>[32]</sup>

当然,中方从达尔富尔问题中还是有一些经验需要总结。首先,从中方材料中可以看出,在2007年中国进行积极的外交努力之前,中方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主动提出建设性提议的场合不是很多。这是由于中国对全球事务的参与是随着近些年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而逐渐加深的,因此我们尚未就世界上不同的地区以及我们在这些地区的长远利益制定出成熟的战略规划。借用王逸舟的表述,这反映的是中国在外交上“中长期战略规划的缺失”。<sup>[33]</sup>其次,从语言的角度考查,上述的问题也是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缺少话语权的表现。相对于美方,中方利用话语来转移或设置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最后,达尔富尔问题也反映出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的加深,在中方所强调的尊重他国主权等传统的外交原则同承担大国责任等相对较新的原则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对于如何处理这一矛盾使两方面的原则达到平衡,中方也尚需要在外交实践中进行更多的学习、总结和创新。

## [注释]

- [1] 关于达尔富尔危机的起因, 见余文胜:《苏丹达尔富尔危机的由来》[J],《国际资料信息》2004年第9期。
- [2] 见阮次山采访苏丹驻华大使萨利赫,《被美国歪曲的达尔富尔问题真相》,《风云对话》,2007年10月18日, <http://phtv.ifeng.com/program/fydh/200710/1018-2144-264205-2.shtml>。
- [3] 本文对中美双方就达尔富尔问题的官方发言和声明的语料分析样本总共由40篇发言和声明(双方各20篇)组成。这些材料主要包括从2004年7月起达尔富尔问题国际化到2008年7月底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达尔富尔“混合行动”延期决议的4年间,两国在联合国及其他场合由官方代表就达尔富尔问题发表的言论和声明,其中中方的20篇包括12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达尔富尔问题决议后的解释性发言,5篇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的发言,2篇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在中外媒体吹风会上的发言或文章,1篇胡锦涛主席会见苏丹总统巴希尔时的发言。美方的20篇包括12篇在时间上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12篇发言相对应的解释性发言,3篇美国总统苏丹问题特别代表安德鲁·纳齐奥斯的发言,2篇布什总统在联合国的发言,以及国务卿鲍威尔、200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和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John Negroponte)就达尔富尔问题的发言各1篇。
- [4] [6] 转引自王瀚东、胡华涛:《论媒介政治语言的研究——从‘巴黎骚乱’的新闻报道说开去》[J],《学术界》2006年第4期,第42页,第41页。
- [5] 参见 Norman Fairclough, *Language and Power*, London: Longman, 1989。
- [7] 此处的定量研究主要依赖于 Wordsmith 软件的词频统计和搭配统计功能。
- [8] 《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2007年7月5日, <http://www.chinaun.org/chn/zgylhg/jjahl/alhrd/sd/t466330.htm>。
- [9] Charles W. Corey, “U.S. Congress Terms Situation in Darfur ‘Genocide’”, July 23, 2004, <http://www.america.gov/st/washfile-english/2004/July/2004~07~23~18~1906~wcyeroc.0.6366999.html>。
- [10] [16] [19] Colin L. Powell, “The Crisis in Darfur”,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September 9, 2004, <http://geneva.usmission.gov/press2004/09~10~Crisisin~Darfur.htm>。
- [11] Colum Lynch, “U.N. Panel Finds No Genocide in Darfur but Urges Tribunals”,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 2005,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52442-2005Jan31.html>。
- [12] Cynthia E. Smith and Tony Pipa, “The Politics of Genocide: U.S. Rhetoric vs. Inaction in Darfur”, 7 April 26 September, 2004”, *Kennedy School Review*, January 1, 2005, p. 132。
- [13] 《被美国歪曲的达尔富尔问题真相》, <http://phtv.ifeng.com/program/fydh/200710/1018-2144-264205-4.shtml>。
- [14] Ban Ki-moon, “A Climate Culprit in Darfur”,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2007,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7/06/15/AR2007061501857.html>。
- [15] 《中非共同语言使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独特作用》,专访中国首位非洲事务特使刘贵今,2007年9月19日, <http://eg.chinaembassy.org/chn/zggk/t364207.htm>。
- [17] House Resolution 422, June 5, 2007, <http://thomas.loc.gov/cgi-bin/query/D?c110:2:/temp/~c1103D5THB>。
- [18] Ronan Farrow and Mia Farrow, “The ‘Genocide Olympic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8, 2007,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17505109799351409.html>。
- [20] Remarks by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in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on Africa, September 25, 2007, <http://www.usunnewyork.usmission.gov/press-releases/20070925-213.html>。
- [21] Andrew S. Natsios,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April 11, 2007, <http://foreign.senate.gov/testimony/2007/NatsiosTestimony070411.pdf>。
- [22] Statement by Ambassador Zalmay Khalilzad,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n the reports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Sudan, in the Security Council, November 27, 2007, <http://www.usunnewyork.usmission.gov/press-releases/20071127-336.html>。
- [23] Remarks by Ambassador Bolton on Iran and the Sudan, at the Security Council Stakeout, April 25, 2006, <http://www.usunnewyork.usmission.gov/press-releases/20060425-086.html>。
- [24] “President Bush Levies New Sanctions against Sudan”, transcript of PBS conversation with U.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Negroponte, May 29, 2007, <http://www.pbs.org/newshour/bb/africa/jair-june07/sudan-0529.html>。
- [25] 联合国安理会各年度的决议均可在其网站上搜索到: <http://www.un.org/Docs/sc/unsc-resolutions.html>。
- [2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是否将达尔富尔问题提交到国际刑事法庭的问题上,美方由于自身主权的顾虑,即,担心国际刑事法庭今后在类似涉及美方人员的问题上对其公民进行审判,因而也对159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美方其实并不是不关心“主权”,问题的关键是谁的主权。可以说,“主权”在国际事务中被美方工具化。
- [27] 2006年11月16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非盟委员会主席科纳雷、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苏丹和

其他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讨论达尔富尔问题。会上,安南提出了联合国分三个阶段向非盟驻达尔富尔部队提供支援的计划:第一阶段,联合国向非盟部队提供价值 2100 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并派遣近 200 名军官、警官和文职官员,在非盟部队中担任参谋和顾问等职务;第二阶段,联合国支援非盟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将达到一定规模;第三阶段,在达尔富尔完成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部队,这支部队将由 1.7 万名军人和 300 名警察组成,其指挥权将掌握在联合国手中。参见《苏丹接受“安南方案”的前前后后》,新华网,2007 年 4 月 18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4/18/content-5994019.htm>。

[28] 关于中国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积极努力,见余建华、王震:《中国在解决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外交努力》[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 年第 2 期,第 11—18 页。

[29] 《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结束》,新华网,2007 年 6 月 22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6/22/content-6278159.htm>。

[30] “China Pushes Sudan to Let UN Troops into Darfur”, *Sudan Tribune*, September 15, 2006, <http://www.sudantribune.com/spip.php?article17596>。

[31] Jonathan Holslag, “China’s Diplomatic Maneuvering on the Question of Darfu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7 (54), February 2008, p. 84.

[32] “UN chief praises China’s role in Darfur”, *China Daily*, June 2, 2007,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7-06/02/content-885775.htm>。

[33] 王逸舟:《中国外交三十年:对进步与不足的若干思考》[J],《外交评论》2007 年第 5 期。

作者简介:顾国平,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 2006 级博士生。(北京,100089)

董继荣,中国日报社高级编辑。(北京,100029)

收稿日期:2009-10-27

修改日期:2009-11-22

## 简讯

# “新中国外交 60 年与世界秩序的变迁” 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2009 年 11 月 7 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新中国外交 60 年与世界秩序的变迁”学术研讨会暨国际问题青年学者论坛在北海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防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 30 多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秦亚青教授应邀与会,并围绕国际体系转型这一主题为参会人员作了主题报告。随后,与会学者围绕着世界秩序的变迁因素与理论研究、大国政治与世界秩序、外交新课题与世界秩序的未来、新中国外交 60 年的实践经验与理论阐释等四个专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他们对新中国外交 60 年所取得的经验与实践提出了深刻反思,对新中国外交历次政策调整与国际秩序变迁存在的密切关系展开了激烈讨论,并对未来中国外交所面临的挑战及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提出了积极建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永辉教授主持了此次会议的开幕式并做闭幕总结。这次研讨会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建院以来第三次举办国际问题青年学者论坛。三年来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与国际关系学术界的积极参与下,论坛已形成一定影响力并具有自身的学术特色,平民化、平和化、平时化和平衡化是该论坛所具备的优势,作为一个学术平台,广大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青年学者能够进一步沟通思想、交流观点,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做出贡献。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杨毅)



---

PKOs, but will participate selectively. UN PKOs will remain to be low cost measures, which South Korea adopts to expand its international space.

##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27 Chinese and U.S. Positions and Policies on the Darfur Issue —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Official Statements *by Gu Guoping & Dong Jirong*

Based on the major official statements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ncerning the Darfur crisis between July, 2004, and July, 2008,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interpret and analyze the two countries' positions and policies on the issue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reasons. The research finds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placate domestic pressure, shift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public opinion and prevent the utilization of Sudanese oil resources by other countries, unilaterally claimed that the Sudanese government conducted "genocide" in Darfur and therefore imposed sanctions. By contrast, China viewed the crisis as a result of local poverty and underdevelopment and proposed dialogue and consultation on an equal basis to solve the crisis peacefully.

### 35 China's Balanced Oil Strategy *by Zhou Yunheng & Zhu Zhongbo*

China cannot expect to eliminate oil security risks only through expansion of supply. A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oil strategy must set priorities and consider tradeoffs. It must balance the effort of increasing oil supply and preparation for the eventuality of interruption of supply, fostering economic growth and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through reform of marketization and maintaining fairness and long term stability.

### 40 Analysis of the Asymmetry of Sino-Japanes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Power

*by Wang Maoping*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theor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Sino-Japanes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r the question of power which arises from it. Viewing from th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mutual trade and direct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two countries are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s and therefore, their interdependence is a kind of 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However, Sino-Japanese trade relation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in the end its own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rid Sino-Japanese cooperation of sensitive a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and move toward a 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 Theoretical Probes

### 46 Some Clarifications on the Concept of Great Power Balancing Behavior *by Liu Feng*

Due t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definitions of the concept of balancing, recent academic researches give rise to great debate on state behavior, and also on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For the reason that balancing act is one of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s of balance of power, our understanding of balancing should be consistent with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fter summarizing the differences in current debat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ree basic elements of balancing act, that is, the goal, the actor and the object, and also the instrumen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elements, we provide an underlying logic on balancing,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y of balance of power, and also a definition which is operationalizable and empirically testable.

### 51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 Hierarchy of Needs in Studying Foreign Policy Making

*by Gao Fei & Xiao Yu*

"System" and "state" are general concepts defined macroscopically, yet the ultimate driving force of political